

上海：党的诞生地系列研究丛书

城市·空间与中共建党

苏智良 / 主 编

姚 霏 张玉菡 / 副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上海：党的诞生地系列研究丛书

城市·空间与中共建党

苏智良 / 主 编

姚 霏 张玉菡 / 副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空间与中共建党 / 苏智良主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8.7

(“上海: 党的诞生地”系列研究丛书)

ISBN 978-7-5444-8413-8

I. ①城… II. ①苏… III. ①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党史-上海-文集 IV. ①D235.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12310 号



责任编辑 林凡凡

封面设计 郑 艺

城市·空间与中共建党

苏智良 主编

姚霏、张玉茜 副主编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张 15.75

字 数 25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8413-8/D·0106

定 价 58.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 021-64377165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规划项目

上海市哲社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历史信息数据库及数字化地图”中期成果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史高峰高原学科规划项目成果

序言：从上海城市空间探寻中共成立的肌理

苏智良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成立，从此她历经磨难，不断壮大。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的执政党，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成员最多的政党。就世界范围的影响而论，因共产党创建所引发的中国革命，是18世纪启蒙思想以来所发生的最持久的一场革命。可以说，上海是中国红色革命之源，也是中国革命的圣地。

那么，上海何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简言之，20世纪20年代初的上海城市，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其他城市、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诸多社会历史条件：作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都市的近代城市，上海为共产党的成立提供最适宜的地理环境；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阶级觉悟的提高，则为共产党的创建奠定阶级基础；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提供便利条件；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上海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与活动中心。而以陈独秀为核心的《新青年》编辑部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则为中共上海发起组提供了基本成员，上海发起组实际担当组建中共的“临时中央”。总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近代化的结果，而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初期的有声有色的活动，也构成了上海近代史的华彩乐章。

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深入研讨中共创建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市历史学会于2017年6月25日联合举办首届“上海：党的诞生地”学术研讨会，主要从上海城市历史，尤其是从城市空间的视角来探究中共建党与上海的关联。

城市空间是促成中共在上海建党的必不可少的“地利”条件。上海近代城市

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在本次会议上,熊月之教授指出,上海这座城市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六大支持系统,这就是先进的思想文化为重要内涵的信息传播系统、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为重要成分的社会基础、联系国际与国内重要城市的水陆交通系统、发达的邮政通信系统、具有现代政党社团活动传统的社会组织系统、维持政党社团正常活动的安全系数。

上海租界地带是中共早期成员活动的舞台,也是中共“一大”的会议场地所在。近代租界的存在,充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租界既是中国受制于帝国主义的耻辱象征,又是中国人民获取现代经验、走向独立的开端。生活在租界里的华人既须忍受二等公民的待遇,又得以在外国势力庇荫下免受军阀或专制政府的骚扰,并躲避连绵不断的天灾人祸、外侵内乱,是中西文明共存、竞争、融合、多元的世界性大都会。相对独立的环境,使得中国革命者可以利用这一“缝隙”,进行反抗统治者、争取国家独立并最终收回外国列强利权的革命活动。

相对于公共租界而言,法租界警力有限,管理相对松懈;法租界繁琐的批捕程序,也容易为革命党人的逃脱和营救提供机会。法租界的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在客观上为中国的革命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当然,这并不是说,法租界当局对中国革命更加同情。共产党的主要创建者陈独秀一生钟情于法国大革命,钟情于法兰西文化,这也是他选择在上海法租界居住与活动的理由之一。他主编的《青年杂志》自创刊号起就特别地加上了法文:LA JEUNESSE。

再深入分析,早期国民党人、共产党人主要栖居在法租界中区。1914年法租界进行了最后一次扩张,将西界推进到了徐家汇地区,然后开启新城区的建设规划。在新兴的“西门区”(Quartier de Siemen)里,辣斐德路(Route Lafayette,今复兴中路)、望志路(Rue Wantz,今兴业路)、西门路(Route Siemen,今自忠路西段)、天文台路(Rue d'Observatoire,今合肥路)、贝勒路(Rue Amiral Bayle,今黄陂南路)、白莱尼蒙马浪路(Rue Brenier de Montmorand,今马当路)、菜市路(Rue du Marché,今顺昌路)等相继建成,这里交通便利,房价相对便宜。贝勒路树德里房屋落成不久,沿街106号、108号(今兴业路的76号、78号)两所房屋就被李汉俊兄弟租下。这个新街区即“西门区”,而中国共产党后来就诞生在这个区域内。

在西门区这个法租界中区,几乎聚集着所有早期共产党人在上海的活动,除

了耳熟能详的树德里中共“一大”会址，还有各位代表居住的博文女校，当然，渔阳里是最典型的一个代表性街区。

渔阳里街区作为近代上海的建党活动中心，被赋予了重要的时代使命；这里成为共产党党团组织的创建中心、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心、革命青年的培育中心、工人运动的策划中心，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创建活动主要集中于此。陈独秀为躲避北洋军阀的追捕，于1920年初由北京返回上海。他入住老渔阳里2号后不久，就开始着手组建共产党的组织。陈独秀居住的老渔阳里，是由8幢小楼组成的街坊，曾先后住过同盟会元老陈其美、民权人士杨杏佛、国民党元老叶楚伦等，这也只有在租界才会有如此奇特的“气场”。1920年5月，陈独秀、李达等人等在渔阳里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社。8月，当时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此诞生。为了不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陈独秀等人于8月22日，在渔阳里6号创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选派时年21岁的俞秀松担任书记。《新青年》编辑部就设在老渔阳里2号，这里便成为马克思主义新的宣传中心。此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了新青年社，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公开出版发行机构。由陈望道翻译的、中国第一个中文译本《共产党宣言》，即交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其后，上海党的早期组织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先后出版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和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等经典篇目，向热心读者尤其是进步青年较为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7月，以维经斯基为负责人的五人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了中俄通讯社，由杨明斋任社长。11月7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创刊，公开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帜。上海共产党早期党团组织为了培养革命青年到苏俄学习，储备党的后备干部，1920年9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办了外国语学社，社址选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同时，渔阳里街区是工人运动的策划中心，1920年8月15日，《劳动界》周刊创办，由陈独秀任主编，李汉俊、沈玄庐等为编辑，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有李达、陈望道、邵力子、袁振英、柯庆施等，该刊成为向工人大众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的通俗读物。10月3日，渔阳里6号召开了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等人以嘉宾的身份出席了会议，陈独秀被邀请为暂设经募处的主任，并促成了上海最早的两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和印刷工会——的诞生。

毫无疑问，红色革命的历史是上海城市的重要文脉。中共“一大”会址及其

周边的众多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是展示红色历史的重要载体,建筑能将历史进行最为理性、直观和广博的呈现。它们见证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之路,体现着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而前仆后继、自强不息的精神,凝聚着各个时期革命前辈、爱国志士的崇高理想、信念、品德和情操,形象而直观,丰富且独特,具有强烈的感召力。

今天的上海,城市更新突飞猛进,城市景观日新月异。我们急须宏观把握城市发展的肌理,整体、全面地梳理红色历史的痕迹,确定哪些历史遗迹、自然景观、城市风貌需要妥善保存或是留心表达。我们须从记录足迹的城市历史出发,以城市变迁线索为参照进行寻访和筛选,整体性保护,而不仅仅是单幢建筑、某个片区的保存。在迎接中共建党百年的重要时刻,我们应该以红色历史发展为脉络,遴选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曾发挥关键作用的地物和建筑作为保护对象,并且有意识地基于红色历史去寻访、发展、保护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建筑、街区,从而系统地保留城市红色历史发展的足迹,并形成保护体系。如合理建立博物馆、纪念馆、名人故居等,设计纪念雕塑和纪念名牌,设置二维码影像资料展示与放映等。有些重要街区,如中共“一大”周边街区,需要进行原样保护,保持并延续原有生活样态,因为那是活着的城市人文脉络。

基于此,我们首先制作了《中共上海建党革命遗址分布图》,该图由吴俊范、姚霏等指导,王小雅、尤亚男、王梦佳等研究生绘制。该图分为党的机构、名人故居旧居、社团组织、事件发生地,体现了党史研究与城市空间相结合,较完整展示中共在上海建党的空间分布。今后还拟进一步深入精细研究,使之更加完善。

期待各方面、各部门精心合作,进一步发掘与继承上海红色文化资源,打造更亮丽的城市红色名片。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史高峰高原学科负责人,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

目 录

序言	苏智良/001
简析近代上海红色资源的独特性	熊月之/001
党的诞生地、革命圣地、建党精神：上海历史内涵	齐卫平/012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张玉菡/022
环境、街区与政治：中共诞生地的城市空间研究	蒋 杰/033
法租界巡捕突闯中共“一大”上海会议会场研究	
..... 中共“一大”嘉兴南湖会议研究课题组/048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郭绪印/079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创建	徐光寿/091
中共建党时期的美国因素初探	邵 雍/107
乡缘与建党：中共创立期的另一种图景	高红霞/122
博文女校与近代上海	韩 晶/138
上海渔阳里街区与中共建党活动	陈安杰/154
政治社会化语境中的宣讲与运动	
——以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上海大学为中心	丰 箫 丰 雪/167
李达与人民出版社	白华山/175
《共产党宣言》的汉译传播与中共建党	张姚俊/182
中共建党经费来源简析	江文君/195
90 年前的上海：远东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姚 霏 苏智良/209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与近代上海文化	陈 晔/221
创榛辟莽，筚路蓝缕：中国共产党“开史”的地方	
——首届“上海：党的诞生地”学术研讨会综述	张 魁/231

简析近代上海红色资源的独特性

熊月之

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代表着吉祥、喜气、热烈、奔放、激情等,有驱逐邪恶的功能。五行中的火所对应的颜色是红色,八卦中的离卦也象征红色的火,古代许多宫殿和庙宇的墙壁都是红色。由此,红色在中国政治上常被用来象征革命,党领导下的革命资源也就被称为红色资源。

近代中国红色资源的形成路径,可以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根据地式的,如井冈山、延安,都是有土地、人民、政权、武装,是自成联系、自成系统的,就像树木长在那片土地上一样。

第二类是纪念地式的,是某一次战争或某一项活动在那里发生,但是其事与其地不具有必然联系。比如说“一大”闭幕会议之于嘉兴南湖、古田会议之于福建古田、遵义会议之于贵州遵义等,都是飘叶之于土地的关系,有一定联系,但不是理由充足的必然关系,不是树木之于土地的关系。

两相比较,就会发现,如果是根据地式的,那里的红色资源呈整体性、密集性、系统性,而纪念地则不一样,呈单一性、孤立性、片段性。

第三类是半根据地、多纪念地式的,近代上海的红色资源即属此类。这是介于前两类之间,同时又两类兼而有之。上海并不是革命根据地——所谓革命根据地,至少具备四要素,即土地、政权、人民与武装,此四者缺一不可——但是,上海又是多纪念地。中国共产党利用上海城市的特点,在这里进行长时间的、繁多的活动,包括中共“一大”“二大”“四大”在这里举行,另有八次中央会议在上海召开,中央局、团中央机关设在这里。上海这个城市对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性、依托性功能。尽管没有政权,没有独立的武装,但是,这里是可

以安身活动的一个基地。因此,可以说上海是有半根据地性质的,又是多纪念地式的。从红色资源角度来看,上海既不属于革命根据地,也不属于一般单一的红色纪念地,而是属于介于两者之间、兼具两种部分功能的第三种类型。

如果把这三种类型放在全国看,跟上海有类似情况的城市不是很多,广州有一点,武汉有一点,但是那两个城市跟上海性质、规模也有所不同。

作为在共产国际直接帮助与支持下创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为宗旨的、具有广泛国际联系的全国性革命政党,其创立与活动,至少需要以下六个相关系统的支撑,即以先进的思想文化为重要内涵的信息传播系统,以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为重要成分的社会基础,联系国际与国内重要城市的水陆交通系统,发达的邮政通信系统,具有现代政党社团活动传统的、可供依托的社会组织系统,维持政党社团正常活动的安全系数。近代上海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些需求。

一、以先进的思想文化为重要内涵的信息传播系统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此前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的广度、武装知识分子的程度,是建党的重要思想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是全无基础、毫无凭借的横空而来,而是在此前一波又一波西方新学说、新思想传播基础上累积与递进而来的。就全中国范围而言,清末民初的上海,正是这样的新学说、新思想的传播高地。

清末民初上海,是西方文化输入中国最大的窗口,无论是器物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先传到上海,在上海有了相当厚实的基础,再传到其他通商口岸和中国内地。西方新学说、新思想,无论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还是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无论是进化论、民约论,还是社会主义学说、无政府主义学说,几乎都是先传入上海,然后扩散开去。以马克思主义传播而论,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就述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1899年《万国公报》发表的《大同学》述及欧洲社会主义流派与马克思学说,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最早传播的记录。到20世纪初,这类传播数量更多,内容更丰富。

西方新学说、新思想传播到上海,其数量之大、比例之高,今人已很难想象。

从晚清到民国,全国新的出版物,上海要占到75%以上,其中以新学说、新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书籍,比例更高。从洋务思想、维新思想到革命思想,上海都是全国传播基地与思想高地。以与中国共产党创立关联度最高的新文化运动而言,上海既是发动地,也是制高点:《新青年》在上海创办;在北京大学高举新文化大旗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马叙伦等,都是清末上海有名的新派人物;新文化运动鼓吹的个性解放、妇女解放以及批判孔教、提倡白话文,在清末上海都已发轫,或已颇有声势;民国初年的上海,继续保持在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方面领导潮流的地位;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南下上海,上海更成为中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高地。

为什么在晚清时候,这些影响不像“五四”时期对社会的冲击那么大呢?这是因为,“五四”时期,北京宣传新文化的那些人,相当部分原来都在上海活动。他们在上海宣传这些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上海社会能接受,就没有也不会起很大的冲突。以男女平等而论,19世纪70年代以后,上海这方面的学说就已经很多。上海有很多妇女在工厂里工作,妇女地位在提高,便要求放脚,发动天足运动,便要求男女平等,进而倡导婚姻自由。以白话文而论,上海晚清时候就有,出了那么多白话报刊和白话书籍,胡适出国以前在上海就编过白话杂志。以批评孔孟之道而论,晚清上海相当普遍,《童子世界》等杂志对于孔孟之道的批判,已经达到相当的深度。但是,当蔡元培、陈独秀一批人到北京宣传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时,北京没有上海那样的社会基础与思想文化基础,没有那么多的现代企业,没有那么多妇女在工厂里工作,没有那么多外国人在那里生活,没有那么多西洋的东西存在日常生活之中,于是,就引起了尖锐的冲突。那个时候,京沪两个城市一个传统、一个现代,文化差异很大,在上海被视为正常的学说、思想、文化,移到北京,便被视为反常。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不同地方的知识分子多已认可上海在新学说、新思想、新文化方面的领先情况。因此,1920年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共产国际以及苏联一些代表在报告里面明确地讲,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1920年,联共(布)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临时执行局主席维连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就说:“上海是中国共产主义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在这里,东亚书记处拥有许多报刊,我们有《上海俄文生活日报》,中文报纸《周报》《社会日报》,杂志《新青年》(是月刊,由北

京大学教授陈独秀博士出版)、《新中国》等。”受俄共(布)华党员中央组织局派遣来华的刘江也称:“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中心,那里可以公开从事宣传活动。那里有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出版300多种出版物(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带有社会主义色彩。那里时而举行群众大会。出版的书籍、报纸和杂志,刊登有苏俄人士,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照片,购买踊跃。”^①

正是由于这么开放的文化氛围,上海才能聚集那么多进步文化人才,出版那么多宣传共产主义、宣传民主革命的书刊与文艺作品。从建党初期的《新青年》《共产党》,中共早期创办的日报《热血日报》《红旗日报》,顶着白色恐怖面世的《前哨》,宣传抗日救亡的《大众生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出版的《新少年报》《文萃》;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译本到进步读物《大众哲学》《西行漫记》《鲁迅全集》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从《国际歌》翻译到《大刀进行曲》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无一不在这里。

民主革命时期,几乎所有重要的马、恩、列的名著都是在上海出版的,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马克思《资本论》、《哲学的贫乏》(许德珩)、《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刘曼)、《马克思工资劳动与资本》与《工资价格及利润》(朱应会)、《革命与反革命》(刘镜团);恩格斯《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李膺杨)、《农民问题》(陆一远)、《费尔巴哈论》(彭嘉生)、《自然辩证法》(杜畏之)、《从猿到人》(成嵩)、《反杜林论》(吴黎平);列宁《帝国主义论》(刘堃平)、《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吴凉)、《国家论》(江一之)、《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傅子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杜畏之)等。

特别要强调的是,马、恩、列著作在上海出版,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上海不是只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民国时期,上海掀起了一个很大的、对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名著的翻译、出版热潮,举凡西方的哲学、经济、社会、历史方面的名著,著名的文艺作品,在上海都有翻译,而且都有很好的销路。这方面,邹振环已有很好的研究。^②

从晚清到民国,上海的出版物,介绍了马克思的著作,介绍了历史唯物主义,介绍了无政府主义……伴随着这些思潮而来的其他西方思想文化,凡是当时人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卢毅:《中共中央早期驻地的变迁》,《百年潮》2012年第12期。

② 邹振环:《西书中译的名著时代在上海形成的原因及其文化意义》,《复旦学报》1992年第2期。

他们认为进步的、有价值的东西,都如潮水般涌来。也正是在这个大潮当中,中国知识分子拓宽了眼界,饱读了众多的西方书籍,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不断地比较、选择,最后觉得马克思主义比较适合中国。

二、以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为重要成分的社会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仿照苏俄共产党建立起来的。以工人阶级为社会基础,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必然的道路选择。上海是近代中国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为集中的地方,这是任何一部中共党史著作都会述及的,兹不赘述。就红色资源的社会基础而言,这里须作三点补充,即城市规模、移民人口与知识分子。

以城市革命为中心,是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之一。以俄为师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必然极其重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上海在1900年,已是超过百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城市。1919年,上海已是中国的超大城市。那年中国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9个,前10名依次是:上海、广州、天津、北京、杭州、福州、苏州、重庆、香港与成都。这时,上海人口为240万,比第2名广州(160万)多80万,比第3名天津(90万)多150万,差不多是北京(85万)的3倍,超过后4名即苏州(60万)、重庆(52.5万)、香港(52.5万)、成都(50万)四个城市的总和。这样超大规模的城市,自然会受到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首先青睐。

移民人口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是全国性政党,党的发起人员来自全国各地,党的中央领导成员来自全国各地,这对于中央所在地人口特点会有一定要求,人口来源越广泛越能适应。近代上海移民通常占总人口80%左右,这些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广东、安徽、山东、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等。这样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口,为全国各地人口在上海立足、活动提供了难得的土壤。建党初期在上海活动的中共领导人,从江苏、浙江、安徽,到湖南、湖北、广东,各处都有,他们在上海都有同乡甚至亲属,这是移民社会为他们提供的特有便利。

近代上海没有严格的户口管理。保甲制度在别的城市可以推行,但是在上海就推行不下去,或推行不彻底。北洋政府时期,上海先后于1920、1924、1925年进行过户籍调查,但不全面,也不精确。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进行过比较全面、细致的调查,但仅是调查而已。五方杂处,不查户口,使得近代上

海社会更具有异质性、匿名性与流动性特点,为中共领导的秘密斗争提供了比较理想的场所。创党时期,安徽人陈独秀、湖北人李汉俊、湖南人李达,在上海活动,各操乡音,但毫无妨碍。1923年,毛泽东在上海闸北香山路公兴路口的三曾里(今象山路公兴路口)的中央办公处,住了近三个月,对外以“报关行”职业为掩护。这所房子住了三户人家,即毛泽东、杨开慧夫妇和孩子,蔡和森、向警予夫妇和孩子,还有罗章龙一家。三户人家都是湖南人。这是当时上海通行的散中有聚的居住方式,即来自同一地方的人习惯于集中居住同一个地段或同一幢房子里。

近代中华民族最先觉悟的都是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其早期活跃分子,也主要是知识分子,不少是留学归国的知识分子。留学生在中外文化沟通中,起了桥梁作用,他们了解中国情况,了解外国的情况,所以,他们会成为一个民族最先觉醒的部分。知识分子集聚的程度、数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党的活动。建党以前,中国集聚知识分子最多的地方,一是上海,二是北京。北京的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几所大学里,数量远不及上海多。上海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除了大学,还有诸多文化机构,包括商务印书馆和一些报刊社、律师事务所等。

上海之所以集聚了那么多的归国留学生,原因有三:一是近代上海城市发展跟西方大城市基本同步,留学生在西方学的东西到上海能够派得上用处;二是生活上面也能够适应,有的人从国外回来以后,到其他地方不能适应,或者工作上不能适应,或者生活上不能适应;三是上海有与外国联系的发达的网络和平台,上海卖外国书、卖外国报刊,与外国学者交往也多。留学生如果到内地去,原来学的东西就派不上用处,或者原来联系的渠道就不通畅,留学的“武功”也就因此废除。曾翻译都德《娜拉女郎》、司汤达《红与黑》的,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四川人罗玉君说过一段话:“当年离开巴黎时我就想,只要这个世界上有地方放下我的书桌,有地方出版我的译著,有年长的年轻的读者喜欢我的书,珍藏我的书,那地方就是我眷恋的……正因为如此,巴黎留不住我,欧洲留不住我,四川太凋蔽也留不住我,留住我的恰恰是上海。”^①她说这段话的时间比较晚,但是,这段话很能反映民国时期留在上海的归国留学生的一般心态。

^① 金平:《上海眷恋》,《文学报》1990年2月15日。

归国留学生在上海分布特点也很有意思，留学欧美的人和留学日本的人不一样。其时归国留学生，从欧美回来的人待遇好一些，从日本回来的情况差一点，所以，从日本回来的海归住在四川路、虹口的相对多一点，从欧美回来的住在法租界的比较多一点。当然也有个别情况，但是总体上如此。

上海吸引了那么多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吸引了那么多全国各地有志向、有才华的人，有那么一批人信仰马克思主义，那是很正常的。

三、联系国际与国内重要城市的水陆交通系统

交通系统与空间移动联系在一起。建党以前全国各地没有哪一个城市有上海那么发达的交通系统。上海襟江带海，内地人（如四川人、湖南人、湖北人）要到国外去，必须经过上海。上海航运系统在 19 世纪后期已经形成，有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运系统，出入上海的轮船和吨位都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铁路火车是人造的交通工具，铁路线如何布局，火车通到什么地方，是由人类主观因素决定的。上海在晚清时候，铁路已经通到南京、杭州，再由南京通往天津，由杭州通到宁波，进而与全国铁路网相连。上海市内交通也远比内地其他城市发达。

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要组织工人活动，特别是地下活动，市内交通是非常重要的支撑条件。晚清上海已有人力车、马车、有轨电车、出租汽车等交通工具，到了民国时期，又增加无轨电车、机动渡轮、公共汽车，公交车辆线路更多。组织地下活动，有时候需要汽车，有时候需要马车，有时候需要人力车。其时，上海道路系统多元而复杂，尤其是南市、闸北、沪西等地方，有些地段汽车很难开进去，尤其是无法开到弄堂里面去，但黄包车能够进去，对于隐蔽战线的斗争，有时候反而更加有利。交通不便有不便的好处，便于隐藏。因此，有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对于党组织在上海的活动有特别的价值。这也是日后党中央机关长期设在这个地方的重要原因。

四、发达的邮政通信系统

民国时期，上海邮路可与全国各地相连接，为国内邮差线的一大中心。上海

口岸停泊着众多国家的邮船，国内的邮差线经上海可联邮世界各国。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俄国等在上海均设有邮局。通信方面，上海国际国内通信联系均极便捷。到19世纪末，上海国际电报北可以经日本与俄罗斯通报，南可以经香港与欧美各国通报，国内通报四通八达，北到北京，东北到山海关，西北到西安，西到汉口，西南到泸州，南到广州。这一通信系统并不是专为政党活动建立的，首先是为了满足商业、军事等方面的需要，但这些通信系统的存在，为政党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便利条件。一个现代性的政党要组织各种活动，必须依托现代性的通信系统。

便捷的交通与通信网络对于城市来说，犹如一个人身手矫健、脉动强劲、经络顺畅，这对于中共领导的政治斗争至关重要。就与外部联系而言，中共中央与各地党组织之间，与共产国际之间，都必须保持密切而通畅的联系。在上海活动的许多领导人，如周恩来、李立三、刘少奇、陈赓、陈毅、彭湃、杨殷、恽代英等，其活动地点，都是在各地流动的，时而北京，时而武汉，时而广东，时而江西。在上海城市内，中共组织在大部分时间里处于秘密状态，党员的住处时常变换，联络地点时常变换，时而租界，时而华界，时而沪西，时而闸北，联系方式也时常变换。在这种状态下，如果没有便捷的交通与通信网络，很难想象。

且以处理顾顺章叛变案件为例。1931年4月24日，顾在武汉被捕叛变。25日晚，时在南京的钱壮飞获悉此信息。26日清晨，情报就传递到时的上海的周恩来那里。周立即安排中共领导机关转移，安排时在天津的中共地下情报员胡底转移。等顾顺章到达南京面见蒋介石时，周恩来这里已经转移妥当。假如这个城市里面没有一个发达的通信系统，没有火车可通，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再以第四次反“围剿”信息传递为例。1932年夏，蒋介石筹划第四次对苏区的“围剿”，拟定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具体进攻计划，以及他独创的所谓“掩体战略”。共产国际派到上海来的红色间谍左尔格获此情报后，立即交给其中国同伴陈翰笙，陈翰笙通过宋庆龄，将情报及时送到了苏区。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以徐向前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为主力，得到情报后，立即作战术转移，主动退出根据地，使国民党军扑了个空，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消灭红军的图谋。这个事件典型地说明，没有便捷的通信系统，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这类例子，在中共党史、军史里不胜枚举。